

党史研究资料

第5期

(总第166期)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目 录

-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渊源..... 毛传清 (2)
- 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历史考察..... 李 蓉 (10)
-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反经济封锁斗争述略..... 姜廷玉 (13)
- 土地革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问题再探..... 曹检生 (17)
- 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新史料..... 张惠才 编译 (20)
- 1949年司徒雷登同陈铭枢的会晤
——美国外交文献选译..... 雷晓霞 译 郑晓国 校 (23)
- 阮啸仙确未出席中共江苏省“二大”..... 文耀奎 (30)
- 刘志丹未参加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 王宝成 王亚东 (32)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渊源

毛传清

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这种历史渊源，是国共两个性质不同且在党章或规约中相互采取排斥态度的政党，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酝酿成功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加深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解，对于认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紧迫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二十世纪初，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们有的加入了同盟会或国民党，甚至成为重要领导人，有的虽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事实上与国民党员一起工作，他们与国民党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创建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仍然和许多国民党人保持友好关系，这些国民党人虽然知道他们身为共产党员或中共的领导人，可是，长期的战斗友谊并不因此而消逝，相反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革命友谊推向新的阶段，在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建立过程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陈独秀较早地投身民主革命的疆场。他曾与张继等人在日本组织“中国青年会”、在章士钊主办的《国民日报》上宣传反清思想，特别是1905年夏，他在芜湖又与柏文蔚成立“岳王会”，从事反清革命。1912年5月，柏文蔚出任安徽都督，请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对陈独秀极为信任，方东荣回忆说：“柏烈武他在民国元年、二年为安徽都督，掌握安徽的军政大权，他凡事都问陈独秀，可以说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陈独秀的主张。”^①因此，有人说陈独秀是个“不参加同盟会的同盟会员，不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员”。陈独秀与张继、柏文蔚等人早期建立的友谊，在往后的岁月中更加可贵。柏文蔚是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张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他们两人在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柏文蔚在国民党一大表决是否同共产党合作时投了赞成票。张继于1922年3月底4月初曾代表孙中山与马林在上海会晤，并安排了马林与孙中山的会见；陈炯明叛变后，陈独秀代表共产党中央立即与张继在上海就两党合作的问题交换了意见；1923年2月，张继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并提请孙中山委派李大钊为国民党北京支部总干事；^②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加入国民党，也经由张继介绍。陈独秀也正因为同一些国民党人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对一些国民党人比较了解，所以远东会议后，他很快认识到，“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③

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与国民党人詹大悲、石瑛等，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并加入了同盟会，参与了领导湖北同盟会的工作。二次革命后，他又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

孙中山。孙中山勉励他：“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④董必武开始在孙中山、廖仲恺、居正等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护法运动失败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成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但这没有动摇董必武对孙中山高尚的人格和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的敬佩，因而在中共一大上，董必武反对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相提并论，极力主张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革命。在国共合作的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鉴于董必武同国民党的密切关系，派他在湖北担任同国民党中央的联络工作。可见，董必武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关系在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建立过程中何等重要。另一方面，与董必武一道战斗的国民党人詹大悲、石瑛均为国民党一大代表，石瑛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一大上对国共合作表示了赞成的态度。

林伯渠是1921年初就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共党员。他早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同盟会的负责人大都和林伯渠发生过密切关系或者打过交道。他曾与廖仲恺一道在东北策划边疆革命，与程潜、覃振等人在湘南举兵响应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对此，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林伯渠“将来必大有所为”。⑤护法运动失败后，林伯渠到上海，在孙中山事务所办理党务工作。后来他回忆说：“我自五四前后即与（孙中山）先生同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往返于上海广州。”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仍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正是因为林伯渠对孙中山的敬佩之情，所以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前后的中共广东支部会议上，林伯渠“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⑦中共中央也鉴于林伯渠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关系密切，派他参与孙中山商谈合作问题。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与孙中山的会晤，他大都参与其间。1922年9月以后，越飞与孙中山双方多次派出代表商谈，也大都与林伯渠有关。孙中山作出与中共合作的决策，林伯渠是有一份功劳的。1923年初，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重新推定了中央党部的领导人，林伯渠被委任为总务部副部长。国民党一大时，林伯渠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与林伯渠有密切关系的廖仲恺是国民党一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覃振也为中央执行委员，程潜为孙中山指定的出席一大代表，他们对国共合作的实现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此外，在国共合作前，由国民党党员转变为共产党员的代表人物还有邵力子、谭平山、朱德、肖楚女、熊雄、杨闇公、徐成章等。他们中许多人参加中共后，仍然保留国民党的党籍，成为跨党党员，如邵力子、谭平山等。1923年5月邵力子还担任了国民党青年同志会的负责人。谭平山参加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等人是知道的，但仍大胆重用。1923年1月，谭平山担任了广东工界宣传员，12月，担任了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些，都为国共合作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

五四爱国运动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组织，他们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参加领导了运动。国民党在革命大潮中，没有以政党的身份站出来领导人民，因而蔡和森说：“五四运动的产生是无政党的领导，国民党站在以外不闻不问的。”⑧

但是，许多国民党员在许多地方也参加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上述两部分人在运动中自然地走在一起。

1919年5月4日，李大钊亲自参加了游行示威，以实际行动支援学生，学生被捕后，他组织进步教职员和学生联合会一起，共同营救被捕学生。国民党员蔡元培与王宠惠则亲自参加北大学生集会，商讨营救办法。蔡元培向学生们说：“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⑨蔡元培为了保出学生，表示“愿以一人抵罪”。^⑩远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学生被捕，立即在宋庆龄的协助下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电，要求掌有实权的皖系头目段祺瑞无条件释放学生。5月7日，各校被捕学生被释返校，这是与他们的营救分不开的。

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进一步唤醒国民起来斗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国民党人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纷纷口诛笔伐，对推动各界群众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告诉人们：“这作恶的人，不仅曹、章、陆一般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⑪第一次向人民指明了要把反对卖国贼的斗争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6月9日，陈独秀、李大钊共同研究，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等五条要求，指明了人民斗争的方向。5月8日，国民党员戴季陶、张继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有日本驻沪各报主笔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戴季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当场还散发了题为《告日本民众书》的传单，稍后他还发表了《拒绝签字》一文。5月13日，南方政府代表唐绍仪提出了有名的八条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⑫博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赞同。六三以后《民国日报》和《星期评论》还连续以显著位置报道了六三运动中上海各地的罢工消息。当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后，民主派人士又提醒罢工工人及各界群众，这只是斗争“告一段落”，还应为拒签和约、根本驱除段祺瑞、张作霖的军事政治势力而继续努力。这些，对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其他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一些国民党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在上海三罢斗争实现过程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运动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学生对商界罢市的发动，以及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爱国宣传对工人罢工的影响表现出来。他们也亲自参加了上海的斗争，黄日葵、许德珩等同上海学联代表一道力促商会“一致行动”。^⑬稍后，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也到达上海，对上海三罢斗争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1919年6月份的报告称：“已有的材料表明在工人阶级中间当无任何有组织的运动在进行，但是已经发现在学生中间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正在散播”，爱国学生“对于本国人口稠密的几个中心城市的广大群众发生巨大影响。”^⑭爱国学生与一些国民党要人联系紧密。张国焘回忆说：“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傖、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叶楚傖、邵力子代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象是一块共事似的。”^⑮可见，在上海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一些国民党人的合作是比较好的。在山东，国民党人王乐平担任秘书长的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而后来为中共一大代表的王尽美、邓恩铭则成为运动的骨干。在广东

五四运动中，锻炼出了许多坚强的骨干和领袖人物，如彭湃、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杨匏安、黄学增等，他们与国民党人林森等组织的“国民后援会”合作得也比较好。所有这些合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在挽留蔡元培和营救陈独秀的活动中，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一些国民党人谱写了一曲友谊之歌。5月9日，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愤而辞职出走。李大钊立即发动北大教师和学生挽留蔡元培。李大钊等作为教职员代表，曾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北大教职员会还作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5月11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次日，与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向政府提出最后质询，如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李大钊在联合会中是“一个活跃人物”，“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①⑥陈独秀被捕后，立即在学生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起而营救。一些国民党人也积极投入营救陈独秀的浪潮中。时任南方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在给北京某要人的电中说：“诤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①⑦“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界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①⑧孙中山对陈独秀这位曾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早已敬慕的，他对陈独秀的被捕也非常关心。9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地提出陈独秀被捕之事，他对许说：“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只是他们（指陈独秀等）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许世英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①⑨9月间，陈独秀出狱，与一些国民党人的营救也是分不开的。顺便说一下，此后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又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大力营救，国民党员褚辅成和张继担任保人，孙中山关照国民党在上海的中华银行支付保金，陈独秀才迅速获释。

总之，在中共成立以前，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之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一些国民党人之间的合作，实质上是国共合作的先声。

(三)

五四爱国运动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中，一些国民党人一度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盟友。

首先，在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猛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一些国民党人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五四后，一些国民党人由过去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转为主要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据统计，1919年8月至次年4月，《建设》杂志共刊载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20余篇（次），约占这期间全部篇（次）的15—20%。从社会影响上看，有的学者估计，“在《建设》上刊登的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译文），不仅在当时全国的期刊中最为突出，甚至为同一时期的《新青年》所不及”。①⑩《星期评论》是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欢迎”。①⑪《觉悟》副刊更是刊载大量马列原著及介绍苏俄各种制度的文章。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当推胡汉民和戴季陶。一些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利于改变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无知，

为以后国民党接受苏俄的帮助，与共产党合作，准备了一定的心理基础。

其次，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主办的《星期评论》和《觉悟》副刊联系密切。《星期评论》是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的指导与经济支持下出现的，主编为国民党员戴季陶和沈玄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汉俊、李大钊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介绍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文章。特别是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星期评论》也编了“劳动纪念号”，配合《新青年》进行宣传。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面还刊载了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的题字。《觉悟》副刊组织上属于国民党领导，发起者是国民党员陈英士，主编为邵力子和叶楚伦，陈望道协助。《觉悟》副刊登载了很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汉俊等人的文章。《觉悟》还与《新青年》密切配合，对社会上泛滥一时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对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批评，产生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续开之际，7月31日《觉悟》上，刊登了“光亮”的《再论太朴论主义的选择》一文，批判了“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义正辞严地公开宣称：“我听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彼的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彼的最近手段，就是‘劳农专政’”。此文应时发表，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再次，一些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尽管有其阶级局限性，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蔡和森说过，当时主要是《新青年》和《星期评论》这两个组织，影响到全国各地的进步团体，形成了早期的先进分子。周恩来同美国友人谈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星期评论》“专门宣传社会主义”，同《新青年》、《每周评论》一样是“进步刊物”，对他的思想进步“有许多影响”。②李立三也指出了《星期评论》社是“和党产生最有关系的组织之一，它和《新青年》在五卅时期先进的文化团体中是最占优势的”，这些先进的文化团体“就造成了共产主义运动”。②

(四)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国民党虽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它在全国仍有较大影响，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③因而，在实际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共两党的一些党员，并肩携手，互相引为同道。

首先，中共正式成立以前，一些国民党人支持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的有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黄日葵等19人，瞿秋白后来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同年12月，李大钊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上述两个研究会成立，都经蔡元培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了《通告》、《启事》。蔡元培还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了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了两间房屋供其使用。蔡元培还曾向有些愿意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北大学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无政府主义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④由于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保护态度，北大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1921年中共成立后，在北京设立了支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成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的主要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邵力子、陈望道、杨明斋等人。值得重视的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了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讨论。邵力子、袁振英、李达、陈公博、施存统等人的回忆都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戴季陶没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但当时戴季陶对共产党是友好、同情甚至是支持的。蔡和森认为，中共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则“是她的‘暂时的’同盟者”。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领导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一些国民党人对工会从筹备到成立都给予了鼓励和支持。特别是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领导人有陈独秀、孙中山、杨明斋、胡汉民、戴季陶等。陈独秀和孙中山在会上同台作了演讲。虽然还没有更多的材料来分析和研究他们讲话的精神，但是，两党领导人第一次同台演讲，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

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国民党人也有密切关系。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根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决定，曾函约国民党人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支部。王乐平把陈的来函介绍给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王尽美和邓恩铭，要他们组织。1920年11月，王乐平与王尽美等一道发起组织了“励新学会”。王乐平在该会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王尽美等人则以该会为基础，进一步组织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1921年春，建立了共产党山东小组。这为以后国共两党在山东进行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中共成立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到国共两党合作的酝酿和建立时，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合作中也有矛盾和斗争，但不是主要的。

在政治活动方面，国民党广州政府允许和支持了共产党在广州开展了许多政治活动，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典型例子。

1922年1月15日，中共广东党组织（包括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互助社和马克思经济学会联合举行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纪念会。这次纪念会事先得到了国民党广东政府的允许和支持。国民党员谢英伯担任了大会主席，林伯渠、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相继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号召海员罢工工人发扬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二人宁死不屈的“非妥协论”精神，“非贯彻阶级斗争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可”，“我们只有联合无产阶级，举行世界大革命，根本推翻资本阶级，以贯彻我们的目的”。⑥在广东公开向海员工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劳动大会与国民党人密切相关。当共产党人准备召开大会时，张继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召集这样一次大会，广州政府可提供方便。⑦于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4月12日发出通知，邀请各地工会组织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5月1日下午大会开幕。参加这次大会的重要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庭（国民党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均为国民党员）、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身份不详）、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共产党员）、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史文彬（共产党员）等。张国焘说：“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二三人参加”。⑧张国焘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后，大会推举了黄焕庭、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5人为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了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决定全

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处。会后，全体代表到越秀楼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听了代表们关于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后，称赞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勉励代表们要努力奋斗。

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和早年共产党人在发动、组织和支持工人运动方面，有过不分先后、不分彼此的合作。在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工运中，国民党人杨德甫、陈天等与共产党人包惠僧、项英、林祥谦、施洋等组织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创办了机关报《真报》，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在徐州召开的筹备会，领导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国共两党为组织这次罢工都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基层党员全部参加，在汉的两党著名领导人都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工作。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国共两党党员的合作是密切的。在国民党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人罢工斗争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各地工会进行支援，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陇海等铁路工人均成立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上海人民在李启汉领导下，筹款、游行，有效地阻止了英商招募新海员的阴谋。中共广东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海员罢工之后，积极进行接待和宣传工作，鼓励海员坚持斗争。当时的一篇《广州观感》介绍说：“凡有空旷之地，聚众一、二百人，多数是宣传共产主义，痛言打破资本制度，一切军阀战争杀人流血，实由制度不良而起。平民感受此种灌输，将来影响甚大”。^②特别是当罢工出现困难局面的关键时刻，2月9日，中共广东支部散发了题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提出“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四项原则，引导海员将罢工进行到最后胜利。同年6月30日，陈独秀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时指出：“广东党组织在海员罢工期间，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布传单三千份”。^③中国共产党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领导的海员罢工。

在军事斗争方面，国共两党党员开展了最早的一次军事合作。1921年秋，孙中山平定广西，准备联络川军，北伐武汉。武汉地区党组织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在湖北的反动统治，也主张联络川军向直系军阀驻鄂的王占元、肖耀南部发动军事进攻。经与陈谭秋商定，董必武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准备启程前往联络。适逢返粤复命的潘怡如（国民党员）再奉孙中山之命，由沪转汉，第二次赴川催促川军出师。于是，董必武和潘怡如、朱旭东一道去四川，船行至巫山登陆，恰遇已任鄂西军总司令的潘正道和随军谋划的詹大悲，正按孙中山的指示，协同援鄂军第一、二军由川出师至巫山。董必武跟随部队指挥作战，辗转巴东、秭归、宜昌等地。到9月下旬，鄂西军和援鄂川军由于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开始败退。退至巫山以后，董必武于危难之际受命代理鄂西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王守愚任参谋长，率军在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不久，潘正道因交涉饷械问题去重庆找刘湘，詹大悲去广东向孙中山汇报情况，鄂西军和施南地方行政工作则由董必武、王守愚、潘怡如轮流负责。后因四川军与吴佩孚勾结，鄂西无法立足，董必武和潘怡如、王守愚均于1922年5月相继返汉。在湖南，孙中山通过何梓林（何叔衡堂兄）与共产党员何叔衡联系，要求何叔衡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帮助北伐军经湖南讨伐北洋军阀。何叔衡承诺了运动驻防湖南的唐生智部队起义参加北伐、收购张敬尧溃退时遗弃的枪械以及动员人民反对军阀统治等工作。为了妥善进行这些工作，何叔衡曾派陈振怡、夏启能往返于湘桂之间，直接与何梓林联系。1922年4、5月间，何叔衡亲赴桂林、韶关会见了孙中山、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就北伐取道湖南问题进行磋商。对此，孙中山曾给予高度评价。据张祝华回忆说：“梓林曾向她谈到：

孙公对叔五（即何叔衡）十分赞赏，说此人诚笃见远，洞悉湘省动静，所述各节，均多可行。”^③这些都为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在培养革命人材方面，国共两党党员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1922年秋，著名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后，邀请邵力子、邓中夏分别担任副校长和教务长，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又聘请瞿秋白、陈望道、何世桢、洪野分别任社会学系、中文系、英文系、美术科主任。还聘请刘大白、茅盾、俞平伯、傅东华、田汉、叶楚傖、丰子恺、施存统、蔡和森、安体诚、张太雷、肖楚女、周建人、蒋光赤、杨明轩、杨贤江、侯绍裘等国共两党党员及进步社会名流到各系任教。学校还设有特别讲座，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李大钊、恽代英、张继、马君武、戴季陶、吴稚晖、杨杏佛、胡汉民、章太炎等都曾到该校讲演，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人材。

总之，在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实践中，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对孙中山的高尚人格是敬佩的，对国民党其他一些领导人是熟识的，孙中山对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是信任的，国民党其他一些领导人对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是了解的。因此，在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建立过程中，“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④大大加速了国共合作的实现。

〔注〕

①方东荣：《‘五四’与‘一一二二’》，台湾《传记文学》第12卷第3期，1977年3月。

②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出版，第158页。

③⑦⑫⑮⑯⑳㉑张国焘：《我的回忆》（一），第213、224、55、69、62、102、225页。

④《董必武选集》第39页。

⑤转引自《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⑥《新华日报》，1943年2月11日。

⑧⑳㉑㉒《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17、9、209—210、26页。

⑨许德珩：《‘五四’二十五周年》，《观察》第4卷第4期，1948年5月8日。

⑩龚振英编：《青岛潮》，第51页。

⑪《每周评论》第22期，1919年5月8日。

⑫《伟大的开端》，第81—82页。

⑬《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56、766页。

⑭⑮⑯《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1922年2月6日、1922年2月17日。

⑰《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7页。

⑱《团结报》1987年11月21日。

⑲《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7页。

㉑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9、31页。

㉓谌小岑：《我所了解的“一劳大”》，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2期。

㉔于松：《何叔衡1922年协助孙中山北伐的一则史实》，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

㉕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1982年7月14日。

（作者单位：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系）

联合政府口号提出的历史考察

李 蓉

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件大事。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林伯渠是怎样代表中共提出这个主张的？中共又是何时把联合政府作为基本主张和政治口号明确下来的？一般史书都一笔带过，没有具体地说明。实际上，严格地说，中共中央开始所提的主张是改组政府而不是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是在林伯渠明确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以后才逐步把联合政府作为一个公开的口号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

(一)

中共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就提出了改组政府主张，抗战中也一直没有放弃民主的要求。在1944年5月开始的国共谈判中，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政府面交意见书，提出有关中国政治的三条意见，包括“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①8月30日林伯渠又重申了中共“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三项要求。②与此同时，中共在小范围内开始与民主党派商讨联合政府问题。8月18、19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要他们首先与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张澜等商谈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

作为公开的政治口号，中共中央开始采用的是改组政府的提法。9月4日，中央指示林伯渠等，“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央还指出，“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③这里所提的改组政府，比以往中共的主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与联合政府主张还有一定的区别。9月7日中央进一步指示林伯渠等“我党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直至9月15日，毛泽东给林伯渠的一个复电中仍用的是“改组政府”的提法。因此，中共中央在林伯渠国民参政会发言前，虽然已经提出了联合政府问题，并与民主党派有所商议，但尚未作为正式的政治口号向国内外公开提出，仍采用的是改组政府的提法。

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的报告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④除了联合政府的提法与中央9月4日指示有所区别以外，“结束一党统治”、“开国事会议”，“准备反攻”等提法都大致相同。

(二)

林伯渠公开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后，中共中央的提法也有所变化。这从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报发表的文章，党的领导人讲话、中共中央指示中都可以得到说明。9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一文，指出改组专制政府主张已由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中提出，“可谓恰合时宜。”文章强调，“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9月22日，《解放日报》转载了林伯渠报告全文，并加了“必须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附题，突出了报告的重心和主题。9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此次国民参政会》，充分肯定中共代表提出的“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公意的要求。”文章在赞成联合政府主张的同时，还提出了彻底改组政府的要求，说明还没有明确两者的相互关系。

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著名的《如何解决》讲演，明确提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⑤这就把改组政府与建立联合政府直接地联系起来。如果说中共以前也考虑到改组政府后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与必要，因而与民主党派在小范围内进行过商谈，现在则已经明确地把联合政府作为改组政府后必须达到的政治目标了；改组政府也就不再作为单独的政治主张，而主要是作为建立联合政府的一种途径和方式了。这无疑是中共中央对改组政府与联合政府关系认识上的一次重要飞跃。但完全实现从改组政府到联合政府主张的转变还有一个过程。10月11日，毛泽东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还着重痛斥了蒋介石拒绝改组政府的无理态度。

11月10日，毛泽东签署了与赫尔利商定的《延安协定草案》，规定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⑥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我党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指出，联合政府是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⑦12月15日，毛泽东把“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作为1945年“全国人民的总任务。”这说明，从林伯渠公开提出联合政府始，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到12月中旬，党中央已经基本上用联合政府的口号取代了原来的改组政府主张，逐步实现了从改组政府到联合政府口号的转变。其完成的标志就是联合政府被作为全国人民总任务的提出。

(三)

既然中央的主张先是改组政府，怎样理解林伯渠是代表中央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呢？这要从林伯渠提出联合政府的依据、原因和条件来看。

1. 中央指示精神是联合政府主张提出的主要依据。如前所述，中央曾提出与民主党派商谈联合政府问题，说明中央有此考虑。同时中央指示有“新政府”的提法，即改组政府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等等。林伯渠理解这里的“新政府，”实际上就是联合政府。因此，林伯渠在10月13日重申联合政府主张时指出，“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绝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⑧可见，在林伯渠看来，改组政府也好，联合政府也好，两者并不冲突、矛盾，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为

着中央指出的废除国民党专政这个共同目的。这与中央的精神完全吻合。

2.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斗争的迫切需要, 是林伯渠明确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党派赞成改组政府, 但不赞成中共单独向国民参政会公开提出改组政府的情况下, 中央让林伯渠等“斟酌情况决定”是否在林伯渠的报告中顺便提到此点。⑨当时抗战已进入后期, 国民党面临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危机, 加紧对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进行压制。国民党把共产党在谈判中提出的民主要求斥之为“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 “徒为异日增加纠纷。”⑩蒋介石又在国民参政会开幕式上大肆鼓吹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面对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 “一切枝枝节节、敷衍的办法都不足以挽救今日的危局。因此必须根据客观要求提出新的政策。”⑪当年与林伯渠在重庆朝夕相处, 并肩战斗的董必武说: “国民党不愿放弃他一党专政, 我们既然反对一党专政, 自然便要建立多党联合的政府, 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⑫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势在必行, 即使变通一下提出联合政府的方式, 不以共产党而以林伯渠个人的名义, 也要利用参政会的讲坛, 向国民党和国内外舆论宣传和表明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 以扩大影响, 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因此, 联合政府口号依据的是中央的指示, 但在提出的时机上却是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联合政府正是中共向国民党统治作斗争的“新政策”, 新武器。

3. 民主党派对联合政府主张的赞同, 是林伯渠明确提出联合政府问题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在取得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 才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⑬如果得不到民主党派的赞成支持, 中共就不可能把联合政府主张公开地提出。因为联合政府必须包括民主党派在内。9月14日, 林伯渠等曾致电中央, 报告与各民主党派商量的结果。其中说, 民主党派赞成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中顺便提出改组政府主张, 因为当时人们没有严格区分改组政府与联合政府的界线, 因此民主党派赞成改组政府就意味着赞成改组政府为联合政府。这样林伯渠才能公开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可见, 无论是联合政府主张提出的时机和条件, 林伯渠都根据中共的一贯态度和立场而来。说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联合政府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四)

既然联合政府主张与改组政府主张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中央要采用联合政府主张而逐渐放弃改组政府主张呢? 这是因为:

1. 联合政府主张明确地回答和解决了用什么政府来代替国民党一党统治问题。改组政府也是要废除一党专政, 但改组后的政府是怎么样? 改组政府主张没有明确回答。联合政府主张则不同。它毫不含糊地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的目标: 通过改组建立联合政府, 为建立联合政府而改组政府。方案非常明确、具体。

2. 联合政府口号比改组政府更为彻底, 改组政府主要是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对现存的机构、人事、政策来一番改造。联合政府则完全抛弃国民党统治, 彻底否定了一党专政。

3. 联合政府口号更有利于动员、组织广泛的民主力量, 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它把中共实施民主政治的步骤和主张更加具体化, 为全国人民更为清晰地勾画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轮廓。

4. 联合政府的口号有利于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据说还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 罗斯福就

有要国民党“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建议。^⑭

1945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在致林伯渠60寿辰贺信中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你所成就的尤为显著。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的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进一步肯定了林伯渠对此作出的贡献。

〔注〕

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94页，第60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0页。

④⑤同上，第589页，第626页。

⑥⑦⑧⑩同上，第638页，第641页，第629页，第603页。

⑨《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卷》第37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

⑪⑫《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68页，第767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

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2页（1973年）。

⑭《罗斯福总统见闻秘录》第154—155页（春光新闻社，1947年）。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反经济封锁斗争述略

姜 廷 玉

1934年秋，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辉煌昭亮”，^①如果说主力红军长征是当时抗击国民党军的第一战场、主战场，那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是抗击国民党军的第二战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两个战场的斗争相互策应，推动着中国革命战争由低潮进入高潮，由国内战争转入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和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它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②“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荣的一页”。^③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在“清剿”中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同时并举的方针，红军和游击队不得不全方位地进行反“清剿”斗争，既要反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政治“清剿”，也要在经济上开展反“封锁”斗争。不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红军和游击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反经济封锁斗争就成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同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清剿”斗争相辅相成，构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整体画面，推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深入发展。

探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反经济封锁斗争，不仅对于研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而且对于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事经济史，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与红军游击队的艰苦生活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必欲“彻底肃清”而后快。国民党先后调集数十万军队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在实行残酷的军事、政治“清剿”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妄图将红军和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国民党军队采取种种方式和手段，对红军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一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构筑堡垒、据点，设置封锁线，在实行军事围困的同时，进行经济封锁，企图借此断绝红军和游击队的粮食及其它物资来源。二是颁发经济封锁法令，禁止人民群众支援红军和游击队。国民党各“清剿”指挥部、绥靖公署和一些地方“清剿”机构，先后颁发了一系列《封锁匪区纲要》、《匪区物质封锁办法》、《断匪接济办法》等经济封锁法令，规定各种物资、粮食“不得运入山中”，“如拿出或拿获，应立即枪决”，以此达到所谓“封锁匪区，断匪接济，绝匪粮食，促其崩溃”的目的。他们强迫山里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居住，“不准私留牲畜谷米杂粮，以为匪用。”并强制实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物”，即按人口限量购买粮食和物品。群众下地种田，应事先报告保甲长，只准每人带够自己个人吃的饭，并由军队监督，“日暮时仍须回移并地点，如违即以通匪论罪”。国民党企图借助于诸如此类的经济封锁手段，割断人民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支援，陷红军游击队于绝境。

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给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那极端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红军和游击队在深山密林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昼伏夜行，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首先是断粮后的饥饿。反“清剿”前，人民群众在山上一些秘密地点给红军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油盐吃光了，红军游击队只好以野果、野菜、野草充饥。饥饿折磨着红军和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其次是寒冷与风雨的折磨。在住宿方面，更是“野营已自无帐篷，大树遮身待天明”。在那些艰苦岁月里，许多红军游击队员几乎没有住过房屋，脱过衣，离过枪睡觉。红军游击队在深山里，开始还可以搭竹棚、杉皮棚、茅草棚居住。当敌人大搜山时，棚子成了敌人袭击的目标，只好拆掉棚子，在大树下或野草丛中过夜。到了深秋和冬天，淫雨绵绵，寒风刺骨，红军游击队生活更加艰难。红军被围困在深山里，天寒无衣，饥肠辘辘，怕暴露目标又不能生火取暖。有些红军游击队战士被活活冻饿而死。红军和游击队不仅要同饥饿、寒冷作斗争，还要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许多红军游击队战士病倒了，有的患腹泻，有的得疟疾，大部分患了夜盲症和水肿病，一些伤员因无药得不到治疗而牺牲。据不完全统计，闽北红军游击队因战斗减员和饥饿、疾病折磨而牺牲的有1000余人，其中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20多人。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④

依靠人民群众，千方百计打破经济封锁

在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下，广大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虽在极端困难和困苦中”，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地坚持斗争到底”。⑤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斗争方式和策略，千方百计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求得生存和发展。

红军和游击队在反击国民党经济封锁斗争方式上表现为多样化，既有武装斗争，又有非

武装斗争；既有公开斗争，又有秘密隐蔽斗争；既有非法斗争，又有合法斗争。几种斗争方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断地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红军和游击队渡过了艰难的岁月。

（一）开展反“移民并村”、反“封山”斗争。

国民党在“清剿”中实行“移民并村”政策，强迫山里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合并到指定的村庄去，然后“封山”，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针对敌人这一企图，各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领导群众开展反“移民并村”反“封山”斗争。1935年，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动员尚未出山的群众，在出山前借谷借米给红军游击队埋藏在游击区，以保证红军游击队给养；组织党员随同出山群众一起并到山外大村庄居住，利用群众出山后没有住房，没有柴烧的困难，发动群众大闹“回山”；红军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活动，打破敌人对沿山的封锁，并以群众性的游击小组，配合游击队迷惑敌人，牵制敌人的行动。这些对策，有效地挫败了国民党的“封山”阴谋。

（二）运用多种巧妙的办法，打破敌人的“济匪者杀”的条规。

国民党在游击区实行“计口购粮”、“计口购物”、“济匪者杀”的条规后，红军和游击队为了不连累群众，又能获得粮食和物品，采取了许多两全的办法。如突然闯到保长和土豪家里，强迫他们出卖粮食或代购物品，使保长和土豪自己首先犯了“济匪”之罪，再也不敢加害卖粮食给红军和游击队的群众。尔后，红军和游击队再逐渐到一些群众家里采购粮食，使敌人的禁粮令失去作用。有时红军和游击队利用群众到城里买东西的机会，让群众代购一些物品，并事先约好，红军游击队员化装在路上等候，将群众买的油、盐、药品等东西，照价转买过来，然后叫他们去向保长、民团报告，说：买的東西在路上被“匪”抢了。这样，红军既获得了急需的物品，又避免了群众“济匪”的罪名，使国民党的“济匪者杀”的条规失去了效用。

（三）深入敌人后方，筹措物资和经费。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和游击队经常寻找时机和空隙，出其不意地深入敌人后方，或袭击敌县城、乡镇和据点，或伏击敌运输车辆，缴获敌人资财。1936年春，鄂豫皖边游击区红28军加强连运用化装奇袭等战术手段，深入到敌人兵力空虚的后方，歼灭一批保安团队，并打开了国民党军下巴河军需仓库，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被服。同年7月间，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奇袭云霄县城，攻进宏利银庄，缴获一批银元和钞票，缓解了经济困难。同年11月，湘鄂赣边红16师深入敌后，奔袭了瑞昌县城，缴获了大量布匹、棉花、药品、银元等，不仅打击了敌人，而且解决了部队过冬棉衣问题。

（四）调整有关政策，兼顾筹款与发展经济。

一是调整对土豪的政策，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三年游击战争初期，红军游击队基本上还采取苏区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在游击战争实践中，许多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认识到，继续采取过去的一套做法，不适合游击战争的新环境，决定调整对土豪的政策。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1935年8月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停止打土豪，改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地為减租减息。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也及时调整政策，对土豪实行区别对待，除罪恶累累的坚决杀掉外，对其它土豪一般不杀，采取不同方式向他们筹款：对游击根据地内的土豪，一般采取借款的方式；对国民党占领区的土豪，抓到后一般采取限期交纳赎款的方式。湘赣边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把以前那种对地主豪绅从“肉体上打击和消灭”的政策，改变为“经济上惩罚”和“精神上感召”的政策。红军游击队抓住地主

豪绅后，反复讲明政策，晓以利害，只要他们愿意为红军游击队提供物资帮助，不再鱼肉乡里，便不伤害他们。这样，既解决了红军游击队的物资和给养，又缩小了红军游击队的对立面，使国民党难以实现对红军游击队的经济封锁，国民党不得不哀叹“各处竟有不肖保甲长富户，希图苟安，免匪绑架，暗购物品接济，实为养匪济匪，影响清剿，殊非浅鲜”。⑥二是调整纠正对商人的政策，变没收财产为保护商人及其贸易。三年游击战争初期，一些游击区由于受过去“左”倾错误的影响，对商人采取没收财产的政策，有的甚至错误地把他们当作反动派来打，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影响了游击区商业的发展，加剧了游击区经济的困难。1935年以后，许多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了对商人的政策。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待商人采取保护自由贸易、公平买卖的政策，不没收他们的货物，不动他们的财产，对城市商人贩运货物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不但在游击根据地内支持经商，执行买卖公平的政策，还鼓励白区商人来游击根据地经商，保护他们的利益和安全。有的红军游击队还积极争取商人帮助购买弹药、药品等物资。这些支持、保护商人和贸易的政策，对于促进游击区的商业发展，克服游击区的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创办新型合作社，保障游击区的物资供应。

在敌情稍有缓和的时候，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游击区，还创办一些新型的合作社，以解决物资供应问题。闽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就采用多种方式，先后在诏安、平和、南靖、漳浦等地创办过这种新型合作社。合作社的商品、经费来源，除从战斗中缴获外，还派游击队员到附近地区抓土豪派款，或靠群众自愿认捐、认股。在一些新开辟的游击区，他们还组织了一批以货郎担流动串乡为主的合作社。这些新型合作社有利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证游击根据地内军民的物资供应。

（六）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游击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坚持。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人民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生存与共，患难相依。在极端残酷、恶劣的环境下，在红军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候，人民群众采取种种巧妙的办法，冲破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支援、接济红军游击队。当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之际，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日用物资埋在地下，做好暗记留给红军游击队。当红军游击队处于粮缺炊断之时，群众乘上山砍柴或下地种田之机，将定量配购的粮、油、盐等，想方设法送给红军游击队。闽西游击区一些基点村的群众，创造发明了“串担装盐”（捣通竹节，将盐装进竹子里做担杆）、“双层桶装米粪”（上层装肥料，下层装米）、“大蒲包装饭”等20余种巧妙办法，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食盐等日用品。鄂豫皖边游击区的群众利用上山下田之机，预先和红军游击队约好地点，穿上新鞋去，脱下鞋留给游击队用，自己赤着脚回家。因为下地只准带一顿饭，他们就自己饿着肚子，把饭放在山上留给游击队员吃。闽北游击区群众，在国民党控制最严的据点里，利用夜幕作掩护，把红军游击队急需的物品用布包好，吊在围墙外面，等待红军游击队派人去取，积极帮助红军游击队渡过艰难岁月。

为了帮助红军和游击队克服经济困难，人民群众舍生忘死，许多群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皖浙赣边游击区有一位叫汪振丰的群众，因为红军游击队保存粮食，被敌人抓去毒刑拷打，始终未透露埋粮地点。出狱后，他举家随游击队上山，为游击队找粮食，挖野菜，每找到一种新野菜，都是自己先尝，几次中毒昏厥。闽北邵武有位叫方嫂的夫妻俩，因为游击队

筹办物品，遭到国民党特务严刑逼供，要他们供出游击队和地下党员，夫妇俩守口如瓶。丈夫惨死在敌人的乱棍之下，5个未成年的孩子都在狱中被敌人杀害。闽北崇安县有一位叫王瑞娇的接头户，因为替游击队筹粮筹盐，国民党烧了她的房屋，烧死了她的丈夫，她仍然不改初衷，继续为红军游击队筹办物资，直到被敌人投入监狱。三年游击战争中像汪振丰、方嫂、王瑞娇这样舍生忘死支援红军游击队的人民群众，当时何止千万！正是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才使红军和游击队得以打破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而生存下来。对此，陈毅曾满怀深情歌颂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反击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斗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军事上、政治上的反“清剿”斗争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使红军和游击队渡过艰难的岁月，迎来了全民族抗战新阶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和卫护好革命的火种，使它不灭地燃烧，终成燎成之势”，“在百折不挠的血战中，为我党锻炼了一批骨干，逐步发展而成为伟大的革命武装。正如长征红军是八路军的前身，南方游击队后来成为新四军”。⑦成为“最好抗日军队之一部”。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红军和游击队反经济封锁斗争的策略和经验，不但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八路军克服经济困难，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丰富了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关于加强军事经济和后勤建设的经验和思想，成为我党我军关于人民战争思想宝库的一部分。

〔注〕

①方方《三年游击战争》，1948年8月1日。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

③陈丕显、叶飞《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载《人民日报》1988年9月8日第五版。

④陈丕显、叶飞《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

⑤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⑥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关于被匪绑架不得以金钱取赎的训令》，1935年5月22日。

⑦谭震林1981年8月11日为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所写的序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土地革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问题再探

曹 检 生

《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刊载的《土地革命初期的“农业集体化”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首次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下的部分苏区一度出现的农业集体化冒进错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分析，这对总结党在农村政策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文中的某些叙述与历史事实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现就手中掌握的史料，对其中的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初探》作者和同志们。